

周而复始的浪潮：政治化与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

圣地亚哥·卡斯铁略-古铁雷斯

圣地亚哥·卡斯铁略-古铁雷斯 (Santiago Castiello-Gutiérrez)：美国新泽西州西顿霍尔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santiago.castiello@shu.edu

历史或许不会简单重演，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我们习惯于将当下视为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仿佛与过去的一切截然不同。然而，细察之下不难发现，我们今日所面临的许多争论与议题，不过是历史对话的回响。幸运的是，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过去三十年间始终记录着这些讨论，为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周期性规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洞见。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如何映照现实，并思考由此可能迎来怎样的未来，对未来三十年的图景加以展望。

深入研读《国际高等教育》档案，可以发现若干贯穿始终的宏观主题。我们对国际化的理解与定义持续演进，驱动机构参与其中的动因亦不断变化。然而，政治化色彩与经济影响这两条线索始终醒目，伴随其中的，是对国际化作为推动积极变革之力量的不懈期许。

国际化的周期与浪潮

1996 年，时任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主席芭芭拉·伯恩 (Barbara Burn)，表达了对 1994 年 11 月美国大选的忧虑。她认为这次选举对联邦政府支持高校国际教育构成了威胁。二十年后，随着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登上全球头条，同样的忧虑卷土重来。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保护主义政策的推行，再次将

国际教育置于风口浪尖，揭示出这一领域在政治变局面前的周期性脆弱。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 在 1999 年的文章中，深入探讨了国际化动因的转变。他指出，曾居于首位的政治取向正逐渐让步于与全球化浪潮相契合的经济理性。如今的讨论再次折射出另一种转变的呼声：超越经济理性，回归政治维度，重拾对“国际教育作为和平力量”的乐观愿景。然而，德·维特 1999 年的文章已向我们发出警示，并提出了以下问题：“谁的和平理念与世界观将得到彰显？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否曾真正能够在与美欧学术界平等的基础上，推广自身对这些议题的理解？”

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我们目睹了无数呼声，要求将国际化路径转变为更具“智识性”、“目的性”、“批判性”和“团结精神”的方向，此类形容词不胜枚举。然而，德·维特与格拉斯 (2024) 所着重指出的近期“负责任的国际化”话语，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在当今多极化世界中，（再）政治化的倾向若缺乏对历史语境与权力动态的清醒认识，很可能不过是这一轮回中的又一次转向。

2004 年，菲利普·阿特巴赫 (Phil Altbach) 在“9·11”事件后美国安全化政策的背景下，宣告了“公民外交与国际教育的终结”。他写道：“从孟买到蒙得维的亚，学生宿舍与

教职人员办公室里流传着同一个声音：美国不再欢迎外国人……（美国）依然是外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他们喜爱美国大学与美国文化，但感到入学之路已不再畅通，或根本不值得为此费心……对美国教育与文化的认同感仍存，但正在迅速消退。”

然而，自 2004 年以来，美国国际学生与访问学者的数量已增长了逾一倍。事实上，自 2005 年至今，唯一打断国际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势头的，只有新冠疫情。然而，阿尔特巴赫 2004 年的那些话，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同样适用，如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语境下，相同的论调又再度充斥于我们的对话之中。

上述案例引发了一个关键追问：我们能否打破这一轮回？我们是否注定要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上，由不同的参与者重演同样的争论，周而复始，每隔十年一次？我当然不愿

低估当前挑战的规模与深远冲击，但我希望、也需要保持审慎的乐观。国际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适应当下现实、主动塑造未来的能力。

为未来规划航向

如果历史能够教给我们什么，那便是：一旦集体性的恐慌平息，我们从震惊与抱怨走向创新与行动，我们或许就能更有条件去实现一种更加公平、更具意义、也更具影响力的国际化；而这正是我们在过去 30 年中反复书写的愿景。教育与民主、自由及道德理想的内在关联，使其始终是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强大力量。这一力量值得我们为之奋争；这一力量若能以历史的经验为引领，必将助力我们共同建构一个更加公正、更为紧密相连的未来。